

# 无处置放的乡愁

——论索尔·贝娄的《耶路撒冷去来》

武跃速

**内容提要** 《耶路撒冷去来》是索尔·贝娄创作的一篇重要散文，记录了作家在耶路撒冷三个月考察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体现了一个作家对世界历史政治的关注。作为现代美国犹太人、作家和知识分子，贝娄面对耶路撒冷这个政治、宗教、军事激烈冲突的敏感地带，表现出价值层面的矛盾纠结，也传递出犹太人无处置放的乡愁。

**关键词** 索尔·贝娄 《耶路撒冷去来》 政治 身份 乡愁

1975 年秋，索尔·贝娄随同应邀赴希伯来大学作系列讲座的妻子，在以色列作了为期三个多月的访问和考察，倾听了许多有关中东问题的见解，目睹了这块土地上的冲突给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带来的灾难和痛苦。回美国后，贝娄发表了长篇散文《耶路撒冷去来》（1976），产生很大反响。批评者认为其访谈对象有局限性，作家在政治问题上缺少统一视角<sup>①</sup>；赞赏者则认为文章以魏玛德国、西班牙内战、英帝国、俄国革命等作为观察和评说现实的历史参照点，显示了丰富的历史知识；贝娄传记作者詹姆斯在 2000 年出版的《贝娄传》中，认为贝娄通过该散文，在世界文坛上确立了他关怀中东政治局势的形象。<sup>②</sup> 可以看出，人们对这篇文章的关注点大多围绕着政治层面。

本文认为，《耶路撒冷去来》本质上是一个文学文本，而且是作家散文随笔中唯一一篇长篇散文，其政治视点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这篇散文在对人类

---

① See <http://www.SaulBellowSociety.org/CriticalOverviewsToSaulBellow'sNovels>, The Official Saul Bellow Website.

② See James Atlas, *Bellow: A Biography*, Random House, Inc. New York, 2000, p. 450.

历史政治风云的描绘和思考中，既体现了一个大作家的情怀，也集中显露了纠葛他一生的问题和矛盾。“我尽力去总结，去‘理顺’，但是这次的主题难以理顺。”<sup>①</sup>这一点并不奇怪，中东政治风云翻卷，阿以冲突、西方大国的介入、历史与现实、军事扩张与宗教习俗等交缠成各种矛盾甚至死结，岂是一介作家能够索解。而贝娄的问题实质上在于，他在审视上述事实的时候，“自我”身份和道德依据纷乱纠结：他既是现代美国人、传统犹太人，也是讲究审美的作家、具有使命意识的知识分子，他不情愿地在这些元素间滑动着，被撕扯着。这些纠结在一起的各种元素一方面或多或少地通向人类历史和文明进程中的难题，具有一定的普泛性，一方面又以各种方式散落于贝娄个人的小说创作中，是贝娄小说人物的重要精神特点，因此，《耶路撒冷去来》也是理解作家整体写作的特殊资源。

## 一、文化身份：美国人和犹太人的纠结

也许，“美籍犹太人”这一身份，是贝娄心底深处难以“理顺”的一个最为基本的既存状况。作为犹太人，生活准则关乎信仰和习俗层面；而作为美国人，遵循的是现代文明理性。身为完成同化的移民二代，贝娄曾多次表述自己在写作上倾向于诉诸人类的普遍性，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犹太作家<sup>②</sup>，这一点可以从其绝大部分小说中得到证实；但这并不等于说贝娄不关心犹太人的遭遇，更不等于说他不会遇到作为美国犹太人的内在价值纠结。尤其是在耶路撒冷这块特殊的土地上，面对自己祖先曾经的圣地，多少代流散族人的精神故乡，盘根错节的历史现实让贝娄无疑会有更多的深刻触动。《耶路撒冷去来》开端便描写了一种尴尬情景：在英国机场和飞往耶路撒冷的飞机上，贝娄和犹太教中严格遵守教规的哈西德教徒劈面相遇，二百多个教徒从各自的居住地出发奔赴以色列，参加他们拉比儿子的割礼仪式。其中一个小家伙恰好和贝娄邻座，除了要求换座位以免和贝娄妻子挨着坐（经书禁止他和没有任何关系的女子坐在一起），他还对会说意第绪语的贝娄吃鸡肉反应很大，并以自己的犹太食物和以后给贝娄发周薪为条件，

<sup>①</sup> 索尔·贝娄《耶路撒冷去来》，王誉公译，收入宋兆林主编《索尔·贝娄全集》第十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83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在括号内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另作注。

<sup>②</sup> See Alan Berger, "The Logic of the Heart: Biblical Identity and American Culture in Saul Bellow's *The Old System*", in *Saul Bellow Journal*, 11: 2/12: 1 (1993/94), pp. 133-145. See also Chirantan Kulshrestha, "A Conversation with Saul Bellow", in *Chicago Review*, 23. 4-24. 1 (1972), pp. 7-15.

劝说贝娄下半辈子再也不准吃“不干净的食品”，以此“拯救”贝娄。贝娄从小生活在犹太人社区，对类似的种种禁忌和规则十分了然且敬重，认为那种单纯的宗教生活对现代物欲主义有一定的免疫力；但他又是在美国现代文明中成长起来的知识人，看到教徒们在生活细节上如此恪守经书规定，衣服边上镶着穗子<sup>①</sup>，还是有种古怪感。他自然没有答应这位小伙子关于以后吃什么的要求，理解归理解，在行为层面上他觉得还是难以折中。下飞机时，面对着哈西德教徒的遗憾，“我们彼此看了最后一眼。他看到的是现代社会制造出的亚伯拉罕子孙后代中的畸形产物。我发现的则是一段历史，一件古董”（《耶》：13）。

一个美国化的犹太人，在以色列的入口处，被迫上了一课极为刻板的犹太规训，算是自家人的一个见面礼。沃尔特·拉克在其《犹太复国主义史》中曾提到那些生活在欧洲而且认同居住国文化的犹太人，他们本身认为自己是欧洲人，但外界有时会把种族的形象投射到他们身上，打乱其内心平静。<sup>②</sup> 贝娄即此类型：我们看到，无论思想还是行为都倾向于“美国人”的贝娄，虽然果断地撕开了与哈西德教徒的族类联系，但心理上依然觉得尴尬、难为情，以至于最后离开耶路撒冷时，在飞机上还庆幸地说了一句“星期六的飞机上没有哈西德人”（《耶》：148）。不过，在理性层面，贝娄在很多事实面前还是明确地坚持现代价值观。散文写到一位以色列法官不顾教义之规与自己所爱的一位离婚女人结婚，贝娄对他艰难曲折的遭遇非常感慨并深表同情；而对哈西德青年居然不知道数学家、物理学家这样的概念也感到震惊；在提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古里安访问美国、呼吁美国犹太人“放弃对非犹太民主的幻想，尽快移民到以色列去”时，贝娄则讽刺他对美国的无知，“好像美国200年的自由民主的历史毫无意义似的”（《耶》：22），这无疑是对美国民主体制的肯定。正是类似的现代理念引发一位希伯来学者的批评，他认为，在贝娄眼里，不仅哈西德人是“好笑的，滑稽的”，耶路撒冷也很糟糕，这篇散文和麦尔维尔及马克·吐温在19世纪对耶路撒冷的丑恶描写一样，体现出美国文学中蔑视以色列的一贯作风。<sup>③</sup>

这就言重了。如果说贝娄对哈西德教徒有“好笑、滑稽”之感，对犹太人的某些刻板教规和封闭性也不怎么认同，但把贝娄提升到美国文学传统对耶路撒

---

① 上帝指示摩西对以色列的子孙们说，“要他们在衣边上饰以流苏”。详见《旧约·民数记》第15章第37至38节。

② 详见沃尔特·拉克《犹太复国主义史》，徐芳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第42页。

③ See Emily Miller Budick, “The Place of Israel in American Writing: Reflections on Saul Bellow’s *To Jerusalem and Back*”, in *South Central Review*, vol. 8, no. 1 (Spring, 1991), pp. 59–70.

冷的“蔑视”，则纯属误读。之所以有此看法，是因为贝娄在描绘游历耶和沙法山谷时，引用了麦尔维尔 1857 年游记中的一段描写，该段文字描述了当地的荒芜和霉气，说几乎是“在坟墓间穿行”，像“魔鬼缠身”。要命的是，贝娄在引用该段描写后未置褒贬，几乎可被视作默认。但是，如果考虑上下文，意义却截然不同。贝娄在耶路撒冷之夜阅读了有关历史上层出不穷的反犹事件的书籍，沉浸于自己种族的悲惨遭遇，又想到一位哈佛教授曾对他说过，“如果犹太人集聚在一个国家，只是为了便于迎接第二次大屠杀，岂不是最可怕的讽刺吗？”（《耶》：24），接着便是第二天游历耶和沙法布满坟墓的山谷，这应该是在一种晦暗心情下对犹太人不幸遭遇的哀伤表达，并无“蔑视”之意。

其实，散文中处处流淌着贝娄对耶路撒冷的感情。在那段被人误解的记述之前，当贝娄和朋友一起参观古城时，曾有过“相反”的描写：

我知道这里的空气肯定有它的特殊意义。柔和的光线也令我心动。我的目光越过起伏不平的岩石和鳞次栉比的小房子，投向了死海。岩石和房顶都跟土地一个颜色，融融的空气就像一个人的体重那样压迫在一片奇怪的死寂之上。这些颜色传递着一种易懂而非懂的信息。宇宙在你眼前，在乱石嶙峋的山谷及其尽头的死水的空廓中诠释自我。在其他地方，人死而瓦解；在这里，人死而融合。（《耶》：18）

这是贝娄进入耶路撒冷后的第一次灵魂悸动，几乎就是一种朝圣，是他作为犹太人对圣地的某种认同和灵魂还乡。况且，他写哈西德教徒时不仅有“惊异”与不适，也有深层次的理解，说他们“在一起祈祷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几千年来，正是这种凝聚力把犹太人团结在一起”（《耶》：12）。后来在和以色列总理拉宾见面时，贝娄还表露过“我不是来抢独家新闻的。我是来观察体验某种状态，或者吸收某种品质的”（《耶》：121）。

早在 1970 年夏天，贝娄曾应希伯来大学英语系邀请到以色列讲学，他的演讲话题就是关于美国社会的变化和自己移民经验中美国梦的变化。他说，犹太父辈艰苦挣扎，子辈在同化过程中接受了“新世界”并走向自由，但 60 年代的混乱使他产生悲观之感，也间接地使他身上的犹太元素增加了。<sup>①</sup> 同年出版的《赛

---

<sup>①</sup> See James Atlas, *Bellow: A Biography*, p. 401.

姆勒先生的行星》便是这种观念的感性注解，主人公是大屠杀中的幸存者，参加过“六天战争”<sup>①</sup>，面对年轻一代的反文化行为十分悲哀。此外，贝娄的《雨王汉德森》、《赫佐格》、《更多的人死于心碎》等小说也反思和批判了现代物欲的泛滥和精神的虚无，《耶路撒冷去来》与之一脉相承，后半部分也描写了作家回到芝加哥后对现代文明物质性一面的茫然和反感。因此，即使贝娄作为现代美国人从行为方式上有些“蔑视”哈西德教徒，他也不可能“蔑视”耶路撒冷，这是他的根系所在，是他深陷现代精神混乱时刻的救赎资源，当他再次来到耶路撒冷，说要“吸收某种品质”，应该就是指犹太文化的精神品质。正像美国的“锡安山骑士团”、“青年犹太”等组织，它们的成员大都是成功的美国犹太人，其复国运动主席还被任命为美国最高法院法官，但他们都竭力支持建立犹太国，并出于内心深处的民族家园情感，用实际行动救助纳粹占领下的欧洲儿童到巴勒斯坦。

在一个去魅时代，现代人最大的痛苦就是信仰问题，没了信仰，家园即废墟，因此文学艺术中会有那么多的“荒原”、“漂泊”主题，贝娄的小说亦然。他从小生活在犹太人文化圈，四岁开始学希伯来语，读《旧约》，觉得上帝是最初的父亲，那些先知祖先们则是自己的家庭成员。但后来到了芝加哥，在公共图书馆开始阅读各种书籍，融入了“美国化”大潮，他的犹太信仰无疑失落了。不过，内心积淀的宗教质素和感情，会在特定的时刻和地方被唤醒。耶路撒冷于贝娄就是这样的地方。散文记述了一天早晨贝娄远望锡安山<sup>②</sup>的深情体验。他说，在辛格的作品中贯穿着犹太先验论的因素，其小说人物会在以色列的天空中看到安琪儿、六翼天使和上帝的天堂；而他曾经认为自己情愿抵制这种想象力的扩张，但那天早晨“我也觉得，耶路撒冷的光具有净化功能，过滤血液和思想。我禁不住认为这光线可能是上帝的外衣”（《耶》：103）。正是在这种体悟中，贝娄走进希腊人区一个石板铺成的院子，在枝繁叶茂的葡萄架下，光线透过叶子闪烁着，“那一天我再也不想往前走了。我不由自主地坐下来，在无与伦比的温馨中一动不动”（《耶》：104），身心感觉到了“美的回归”。

① 1967年5月19日，埃及总统派兵重新占领了加沙地区，23日关闭亚喀巴湾，不准以色列船只通航。6月5日至10日六天中，以色列人发动了一场闪电战争，击败了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等国，然后在联合国安排下实现停火。

② 锡安山，这座位于耶路撒冷城南的圣山，对世代代辗转流散、无国无家的犹太人来说，是一个渗透希望和信心的爱之地，是家园的象征符号。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俄国曾经有过“热爱圣山运动”，维也纳犹太学生办有名为《锡安》的杂志，美国犹太人建立了“锡安山俱乐部”等，可见锡安山在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性。

这里需要提到贝娄对“人智学”的修习。1973年，贝娄在纽约参加了斯特纳“人智学”小组活动，该小组参加者会进行沉思练习，意欲在冥思中达成生命与宇宙的互识共融。据贝娄解释，这也是一种信仰，是在以科学为首位的现代世界，为转化人类知识经验的有限性而架起通向精神生命的桥梁。<sup>①</sup>在去耶路撒冷之前不久刚出版的《洪堡的礼物》中，主人公西特林在一个物质世界经历磨难后，“落难”西班牙一个偏僻的小旅馆，最后也在沉思中到达类似的精神苏醒。作为一个现代美国人，贝娄一边感受着锡安山的灵气，一边在理性领域评判“泛灵论”，一边又为自己与圣灵有片刻交流而欣慰。他最终把宗教感情、民族文化和艺术美感融为了一体，在一个静谧瞬间，脱开了现代人的喧嚣和重压，脱开了满世界的动乱和战争，身心敞开，和宇宙自然相融合。

这些交缠在一起的精神质素，虽然无法分清主次，但无疑都与犹太精神相契合。正是拥有着这样的价值资源，才可能使贝娄看到以色列的力量和生气，散文中也引用了被希伯来学者所批评的马克·吐温《傻子国外旅行记》中对巴勒斯坦的描写，如“田野枯萎，活力消失”，“荒凉而丑陋”，但引用之后贝娄接着写道，“在这片丑陋的梦幻之地上，犹太复国主义者种植果树、开垦土地，建立了欣欣向荣的社会。二战后新生的国家很少有这般成功的，以色列便是其中之一”（《耶》：168）。如果说面向死海和锡安山的感动属于纯粹的精神维度，是贝娄出自身心的宗教心魂，那么正视以色列的发展则是一种基于事实的切实赞赏。这些都和他的美国人价值视角混为一体，是他身上难以磨灭的文化交合之产儿。

不过，这种交合元素也常常使贝娄思绪紊乱。散文写到，在耶路撒冷读到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中的一句话“意大利犹太佬的土地”，这个不恭的称谓让他很难过，“如果是在芝加哥读这样的东西，我则毫不觉得奇怪；但今天是在耶路撒冷，我便不由得一怔，遂将书放下了”（《耶》：22）。这段文字形象地表现了贝娄在两种身份之间的摇摆，就像菲利普·罗斯的《波特尼的抱怨》中的同名主人公在美国觉得自己是犹太人，和别人格格不入，到了以色列又被当做典型的美国人一样。其实，类似的感受在美国黑人文学、华裔文学中都是常见的主题，这是具有双重甚至多重文化根源的人们的宿命和永无着落的乡愁，也是贝娄小说中那些犹太主人公们总是惶惑不安的深层原因之一。

<sup>①</sup> See James Atlas, *Bellow: A Biography*, pp. 436-437.

## 二、社会身份：作家与知识分子的纠结

耶路撒冷之行，贝娄的明确身份是作家，在他遭遇到的各种问题中，无论是犹太人态度、美国政策、以色列现状，他大都以自己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保持了观察和中立的立场，这也是他作为犹太人招致批评的一个原因。但贝娄也表现了他对这些问题的矛盾纠结，这亦可看做其族裔情感在政治社会问题上的延伸。

贝娄认为，作家、文人经常弄不清诡异复杂的政治现实，会在理论思维中作出简单化的错误判断，因此不适宜担当介入现实的知识分子角色，更不能引领媒体和思想界。《耶路撒冷去来》用大量篇幅批评了萨特对前苏联问题和阿以冲突的介入态度，成为其观点的典型例证。贝娄对萨特的不满由来已久，早在1948至1950年间，贝娄从法国《现代》杂志上了解到萨特对苏联义无反顾的支持，当时就很惊异为什么萨特对苏联的清洗现实如此无知或佯装“无知”，后来还在文章中把萨特称作“马基雅维利式”的人。<sup>①</sup>而在以色列问题上，贝娄认为萨特一如既往地信口开河，居然下结论说只有阿拉伯社会主义才能带来和平与正义云云。

贝娄对萨特的批评，涉及萨特有关帝国主义的概念。贝娄认为，在萨特眼里，世界上有两个超级大国，但只有美国是邪恶的，这种想法来自列宁1916年的小册子《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当萨特把此概念当做法宝到处使用时，很容易形成一种片面的思维模式，把复杂的阿以冲突简单化。另一方面，贝娄对萨特的反感也和贝娄的感情态度和立足点有关。作为犹太人，贝娄感觉到伤害，族类的历史劫难使他无比心伤，最有力的证明就是1967年“六天战争”爆发，他认为在四分之一世纪里犹太人再次受到灭绝威胁，当时毅然以记者身份奔赴以色列作战地报道。可以说，这是贝娄作为犹太人生命历程中的华彩时刻，但也是他作为作家第一次亲眼看到了战场的残酷，人性视角里出现的是人的生命和文明的毁坏，震惊之余他对人类之争端深感悲哀。《耶路撒冷去来》重现了这些情景和他彼时的感受。在此背景上，他用了讽刺挖苦的修辞，不无偏见地把萨特写成一个自以为是、缺少自知之明、仅凭一点粗陋知识就对那些身处悲苦之海的人们指手画脚的大老粗。

---

<sup>①</sup> 参见索尔·贝娄《作家·文人·政治：回忆纪要》，李自修译，收入宋兆林主编《索尔·贝娄全集》第十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35页。

公平而论，萨特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的问题还是比较公允的，甚至说过阿以冲突不能说哪一方是正义的，贝娄也在散文中提到萨特对阿以冲突总体上的同情立场，但就是掩饰不住自己的厌恶。这和贝娄对法国左派知识分子的一贯看法有关，他认为这些思想精英不知珍惜几百年来的启蒙成果，在反思和批判西方民主现实时走向极端，不惜为集权主义铺垫温床，萨特便是其中的翘楚。无论作为对美国自由民主信任态度的美国人，还是作为拥有民族感情的犹太人，贝娄在面对阿以问题时相当敏感，因此就把萨特当做了靶子。由于萨特对世界政治的一贯“介入”立场，贝娄也由此引出自己对作家介入政治的怀疑态度。1993年，贝娄在《国民权利》上发表文章论及此点，提到他和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的一次相遇：格拉斯是现实政治的热衷分子，曾经为布拉特总理竞选卖力，贝娄在晚餐会上问及此事并暗示了自己的观点“是什么原因？作家应该参与政治吗？他一声不吭，朝我瞪了一眼，仿佛让他坐在格林尼治村的一个白痴旁边，激怒了他似的……”<sup>①</sup>这虽自我嘲弄但也立场鲜明。在《耶路撒冷去来》一文里，贝娄还说“我们不像法国人那样，期望思想在道德领域、政治领域中要有结果。在美国要成为知识分子，有时意味着幽闭在私人的生活中思索，却又多少羞愧地觉得思索于事无补。”（《耶》：236）

一是事实混杂，难以弄清，一是“于事无补”，贝娄对历史风云可谓洞察于胸。然而富有趣味的是，在耶路撒冷，尽管一再声明自己的作家和观察者身份，贝娄却在不少时候观点鲜明且挺身而出，扮演的恰恰就是他一直不认可的介入型知识分子角色。

1973年，贝娄曾写信给《世界报》，指出法国传统中对犹太人的两种态度：一种是革命态度，它使得犹太人在法国获得了公民权；另一种是反犹主义的，具体表现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雷福斯事件<sup>②</sup>和维希政府对犹太人的迫害。在当年的中东战争中，法国外交部长提出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渴望返回家园的正当性，这是对以色列犹太人的谴责。《世界报》自1973年以来，公开站在阿拉伯人一边，支持阿拉伯极端分子，还说以色列是殖民主义者，贝娄在信中希望法国不要抛弃另外那种革命态度，但一直没有回音。这次在耶路撒冷亚美尼亚大主教

<sup>①</sup> 索尔·贝娄《作家·文人·政治：回忆纪要》，第134页。

<sup>②</sup> 1894年，法国犹太裔军官德雷福斯被诬陷向德国出卖军事情报，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处其终身监禁。法国社会由此爆发严重抗议和冲突，但由于军方出于反犹倾向，一直维持错判，直到1906年才在公众和知识分子的干预下为之正式平反。

的宴会上，贝娄巧遇法国《世界报》国际新闻的编辑米歇尔·达都，于是适时地讽刺了达都主菜后抽烟的缺少教养，并借这篇散文发出了责备《世界报》的声音。从这点上来看，贝娄事实上已经介入了现实政治。而且，当年他的信是由荒诞派剧作家尤内斯库和小说家马内斯分别交给编辑们的，作家们一起在一桩关乎世界公义的公案中担当了角色。

散文由此谈及媒介的倾向性。贝娄非常重视媒介的作用，在文中提到在埃及总统萨达特访问美国时，他复印了萨达特给希特勒的颂歌并交给了《纽约时报》，希望提醒美国政界对其曾经的纳粹倾向给予关注。更有意味的是，贝娄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总理拉宾见面时，还出主意让拉宾对美国媒介和知识界用些心思，在正义和战略方面争取赢得美国公众舆论的支持，因为他认为阿拉伯世界对欧洲的宣传就卓有成效。耶路撒冷之行结束后，贝娄回到美国，去华盛顿拜见基辛格，后者在会面中貌似随意地说到希望美国犹太人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显然是把贝娄也当作施加“压力”的人了；且贝娄是犹太人、文坛名人，在耶路撒冷人们一直问起他美国对以色列的态度，因此他此番去见基辛格，不能说内心没有“促进”美国援助的愿望。所有这些，都是介入的表现。

事实上，贝娄对世界政治局势的关怀是从骨子里带来的。出身俄裔移民家庭，在贝娄的青少年时期，家庭饭桌上经常的话题就是沙皇、战争、列宁、布尔什维克。20世纪30年代，芝加哥移民知识分子站在肥皂箱上发表演说，宣传马列主义，这是贝娄激进教育的肇始；而他周围的朋友大都是《党派评论》的撰稿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就是托洛茨基派。当时贝娄正在念大学，虽然对文学情有独钟，一心要成为作家，但和那时许多的西方青年男女一样，也为自由和正义而激动，还成了托洛茨基的崇拜者。1940年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暗杀，当时贝娄正在墨西哥游历，一心希望与托见面，但约见的那天清晨他见到的已经是托的尸体，从此懂得了面对极权制度无限延伸的生杀权力，历史哲学、思想、目标和意志是“多么微不足道”<sup>①</sup>。20世纪60年代，已成名流的贝娄在核武器、民权、越战等激动美国公众的问题上也都表达过自己的立场，还给芝加哥《太阳报》写信论及自己对一些群众集会的看法等，这些都体现了他的公共知识分子情怀。因此，在耶路撒冷这个处处是政治的敏感地带，触目所见的族类困境使贝娄

---

① 索尔·贝娄《作家·文人·政治：回忆纪要》，第128页。

不由自主地想有所改变，但又深知自己以及许多献身此道的学者、知识分子的无能为力，这种心态添加了他的烦恼。

### 三、“事实王国”和“价值标准王国”的纠结

在使得贝娄声名大噪的小说《赫佐格》中，同名主人公曾说“事实王国和价值标准王国不是永远隔绝的”，表明他对那些把他打翻在地的烦恼“事实”的超越，在“已然”的事实世界心存“应然”的价值理念。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中引用了这句话，并和哲学家沃尔夫冈·克勒的一本书《价值标准在事实世界中的地位》相提并论，看做是贝娄对世界的根本性乐观态度。此言甚确，在贝娄的大多小说中，尽管有成堆的烦恼、不幸、人性陷落，但总有一些精神价值持有者和对精神价值的探寻，使灰暗的天空洒下阳光，在特殊时刻托起了“价值标准”的照耀。但在耶路撒冷这个特殊地方，这两个维度常常会掺杂在一起，成为贝娄最难“理顺”的深层纠葛，并由此指向人类生存的悖论。

借用两个“王国”概念，贝娄在耶路撒冷的“事实王国”内容有：第一，灾难生活。他看到以色列的每一个家庭都在失去儿子，而阿拉伯又难民成堆，恐怖的爆炸声随时会突然响起，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在自认为神圣正义的大小战斗中书写各自的悲剧。第二，犹太人的命运。历史上不断的反犹主义，让犹太人在现实中依然难以建造安全的立足之地，他们从纳粹的死亡集中营中幸存下来，却没有一个世界公认的属于自己的国家。贝娄悲叹，“在世界各民族中，只有犹太人没有能够在自己的出生地建立起毫无疑问的天赋人权”（《耶》：36）。第三，众声喧哗。在阿以冲突中，西方大国都在权衡自己的利益，阿以之间互相仇恨，政治家、知识分子、普通人在各种话语聒噪中喋喋不休又难以对话。贝娄说，“我仔细地听，贴近地听，全神贯注地听，我一生还从未这般认真地听过，但我还是时常感到我好像坠入无边无际的大海”（《耶》：34）。

在这大堆的事实中，贝娄的痛苦是和平遥遥无期。贝娄在道德和人性的价值维度上纠结，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

一是犹太民族的建国，这是所有问题的起点。从19世纪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以来，犹太人步履维艰。不用说，1947年联合国决议建立以色列国家，是犹太人的一个福音，但伴随着建国过程，引起了长期战争，这中间孰是孰非，贝娄认为复杂难言。他借用一位中东学者的话说，所有民族都有其血腥历史，以色列的

建立也难以例外，“一个民族国家几乎从未在没有暴力和不公正的情况下创立起来”（《耶》：119），阿拉伯人几百年前也是作为征服者来到这里，这是人类追求生存的历史悖论，是人类之大不幸，但问题在于唯独以色列受到很多谴责。贝娄质疑这是否是因为犹太人喜欢讲道德，而弱小者的过失尤其引人注目，因为萨特说过，正是因为犹太人遭受了可怕的迫害，“以色列国家才必须树立一个榜样；我们对这个国家比对别的国家要求的更多”（《耶》：134）。贝娄认为这很不公平，在20世纪这个凌乱的时代，世界到处是难民，但只有巴勒斯坦人的情况永远受到道德关注：

只要牵扯到以色列，世界就充满了道德良知。在欧洲，道德标准是个幽灵，一涉及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就变成了一个血气方刚的巨人。这是不是因为以色列被赋予了自由民主的责任，还是因为其他原因？瑞士作为冬天的度假胜地，达尔马提亚海岸作为夏天的旅游胜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满足了西方道义上的需要，是一种道德上的度假胜地。（《耶》：144）

贝娄对西方舆论界的责备直指人性弱点——对别人进行道德绑架以表示自己的道德高度。但是否为了生存就可以获得战争的正义性，因为苦难就可以模糊人性的底线？这是贝娄无力面对的问题。1961年，纳粹罪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法庭受审，起诉书带着浓重的悲情色彩控诉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为此，阿伦特从法理角度指出这种修辞方式“不是充满伸张正义的要求，而是为了满足被害者的报复欲望及这种权利”，不是“法律优先”而是“原告优先”。<sup>①</sup>阿伦特强调的是，纳粹大屠杀是一桩反人类罪行，是任意改变人类多样性的行为，触犯了人类生存之“法”；但如果仅仅站在犹太人灾难的角度，会偏离人性正义而突出民族仇恨，使报复披上正义色彩。这是以色列的难题。使贝娄深感不安的也正是这样的困境，他阅读了大量历史政治文献，追问犹太人在这块本就纷乱的土地上建立国家的最初愿望，他也看到历史车轮的前行出现了难以控制的偏差，于是引出了第二个向度：

文化与宗教褊狭问题。散文详细引用了希伯来大学教授拉姆的观点，后者认为以色列复国主义在“拯救”和“解放”中迷失了方向。所谓拯救，是把一个

---

① 详见汉娜·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孙传钊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9页。

流散困厄的民族集中在一片疆土之内，以便把握自己的生存命运，这是早期复国者的求生诉求，也是联合国决议成立以色列国家的初衷；所谓解放，则是依靠军事力量扩展领土，占领祖先曾经定居过、但现在已有大批阿拉伯人居住的所谓犹太人的“希望之乡”，这是后期复国者的神圣宗教旗帜。本来“拯救”的实现就很艰辛，“解放”的行动则带来更大的困境。正是后者引来许多道德谴责，拉姆因此希望以色列能够重回起点以寻求和平。从上下文的叙述来看，贝娄是赞成拉姆观点的，他不仅看到“解放”“希望之乡”的宗教褊狭，许多极端分子狂热地要占领《圣经》中所说的“应许之地”；也看到了阿拉伯人的宗教褊狭，宣称他们对圣地的永久权利，对以色列“即使拥有阿拉伯地区的百分之一的六分之一都不能容忍”，于是两个阵营都在所谓的圣战中陷入泥沼。

贝娄在此感到深深的无奈与悲哀。巴勒斯坦这块土地自近代起就一直是奥斯曼帝国的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被英国托管，那里生活着犹太移民、阿拉伯基督徒、穆斯林，几大宗教信仰都在起作用，且在互为因果的纠缠中互相损害。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胡克在 20 世纪 40 年代曾说过，“从来没有一次显著地改变事件进程的群众运动，其参加的个人不是为某种信仰所鼓舞的”<sup>①</sup>，西方历史上的宗教战争频繁，他认为这种信仰导致歧途是人类的特点和历史证词。而贝娄在耶路撒冷面对着千万生命的牺牲，作为作家的他不可避免地将目光投向了争端的心理与文化刻度，认为各种文化和宗教信仰都应该有能力拥有仁慈而宽容的灵活性，为生存而包容，但事实上各民族都在褊狭中剑拔弩张。他谈到他在做人类学研究生时，曾经想去研究爱斯基摩人部落，据说他们宁愿饿死也不吃属于禁忌的食物，他想搞清楚，人类在多大程度上屈从于文化偏见？在哪一个刻度上，需要生存的动物可以打破习俗和信仰的限制？当然，在原始社会，客观现实可能所占的分量更少，但当前文明人是否有进步，他很茫然，至少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中，他看到的还是文化偏见和宗教习俗的昌盛。他和朋友探讨此事，说到犹太人经受劫难之后，只有犹太教堂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凝聚力，但这也同时使得犹太教权主义在以色列大行其道，犹太民族主义分子正在使用神圣战争的语言，这就是宗教的悖论。

也许，这是贝娄作为美国作家的现代理性思维方式。尽管他不断为族类没有自己的祖国而悲伤，尽管他为世界舆论对族类的道德批评而愤愤不平，但至少他

---

① 悉尼·胡克《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金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 年，第 3 页。

不能够接受耶路撒冷那些由信仰带来的行动。当然，贝娄无意对这块土地上的冲突去作道德评判，这是他一直刻意规避的；但他又带着自己族类刻骨铭心的创痛，难以避免情感“介入”地去追根溯源。正是被这种情感驱动，贝娄着意描写了他在耶路撒冷看到的那些大度和气的建设者，比如在以色列和阿拉伯人之间努力建立和解的诗人兼记者钱姆·古里，在黄沙野地创建了科研中心的魏茨格尔，还有“以色列最有价值的政治人物”（《耶》：102）、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生活需求而日夜奔忙的科勒克市长等，散文细致地描绘了这些人物和故事，它们成为散落在沉重无解的“事实王国”中的阳光，从人性与文明的角度铸造着《耶路撒冷去来》中的“价值标准王国”。这也是贝娄价值纠结中的一缕慰藉。

长篇散文结尾，在世界各处的轰炸报道中，贝娄放眼望去，想到所有的问题只不过是人类历史中的一些片段，他无限感慨地说，杀戮的历史还在世界各地以各种形式继续，不仅仅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当然也不仅是出于宗教习俗缘由，“为了政治原因杀人的热望像以往一样迫切，或许政治目的可以使杀人合法化”（《耶》：190）。在去耶路撒冷之前，贝娄和《纽约时报》有过一个访谈，其中谈到20世纪现代主义作家在审美层面上的小众性，19世纪经典人道主义作家对社会正义关怀的大众性，而他的文学理想介乎两者中间。<sup>①</sup>应该说，贝娄实现了他的理想，他在不乏现代手法的写作中伤世忧人：为不断的杀戮带来的源源不绝的人类伤害，为人性在各种冲突中的僵化与扭曲，为仇恨一直在世界各处弥漫而不得终止。这种乡愁和沉痛，正是他在耶路撒冷之“去”与“来”中各种纠结的中心点所在。

〔作者简介〕 武跃速，女，1958年生，文学博士，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近期发表论文有《记忆对忘却的人性审判——贝娄〈贝拉罗莎暗道〉的道德哲学》（载《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存在意义的焦虑：论尤奈斯库的戏剧》（载《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3期）等。

责任编辑：严蓓雯

---

<sup>①</sup> See James Atlas, *Bellow: A Biography*, pp. 448–449.